

主编：邵敬敏 XIANDAI HANYU TONGLUN
CANKAOWENXIAN JINGXUAN

现代汉语通论

参考文献精选

现代汉语通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

主 编 邵敬敏
副主编 徐默凡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 / 邵敬敏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9
ISBN 7-5320-8220-2

I. 现... II. 邵... III. 汉语—现代—研究—文集
IV. H1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8685号

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

邵敬敏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603,000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本

ISBN 7-5320-8220-2/G·8276 定价:(软精)29.00元

编 选 说 明

一、《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以下简称《精选》),是与《现代汉语通论》教材配套的参考资料。学习现代汉语的大学生可以作为课外辅助读物,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的教师也可以当作备课参考资料,有志于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的青年学子也可以作为报考的参考书。

二、入选的论文,都是在 1978 年至 2001 年间发表的。大部分选自杂志或论文集,也有少数节选自专著。1978 年之前也有很多优秀论文,考虑到已经出过一些选集(如《现代汉语参考资料》),我们原则上不再考虑列选。

三、只编选在国内刊物上正式发表的文章,凡在国外发表的以及翻译的文章,一律不入选。

四、根据教学的需要,我们尽可能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受到编者水平、资料以及篇幅等限制,许多精彩的论文没能够入选,敬请谅解。

五、本《精选》的编排,跟《现代汉语通论》章节大体吻合,一共 42 篇,分为:(一)绪论(4 篇)、(二)语音(4 篇)、(三)汉字(6 篇)、(四)词汇(9 篇)、(五)语法(14 篇)、(六)语用(5 篇)。每部分内部的次序也跟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一致。

六、我们尊重作者的著作权,除了个别印刷上的错误,文章原则上不作改动,各式字母音标也一律依旧。个别篇目,根据作者要求,采用的是最新修订稿。

七、作者只列姓名,不标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

八、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或有什么建议,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一) 绪论	(1)
汉语	朱德熙(1)
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詹伯慧(10)
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	钱曾怡(14)
对汉语规范化的总体认识	吕冀平 戴昭铭(22)
(二) 语音	(31)
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	李延瑞(31)
语流音变	林 焘 王理嘉(37)
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	文 炼(47)
汉语节奏的周期及层次	吴洁敏(51)
(三) 汉字	(57)
汉字的性质	裘锡圭(57)
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费锦昌(63)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	周有光(70)
论汉字简化	陈章太(76)
简化字与繁体字的转换	苏培成(81)
汉字和汉语的计算机处理	冯志伟(86)
(四) 词汇	(102)
现代汉语语素说略	施关淦(102)
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	郭良夫(107)
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	刘叔新(114)
同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符准青(119)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关系	谢文庆(125)
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	朱永锴 林伦伦(132)
成语的划界、定型和释义问题	徐耀民(138)
歇后语的语义	温端政(144)
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	陈章太(150)
(五) 语法	(156)
语法与语法学	邢公畹(156)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吕叔湘(160)
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	胡裕树 范 晓(167)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	胡明扬(175)
虚词研究浅论	陆俭明 马 真(183)
词组的研究	马庆株(193)
句子分析漫谈	胡 附 文 炼(200)

十多年来现代汉语语法分析方法述评·····	徐 枢(206)
复句问题论说·····	邢福义(212)
语义分析说略·····	范开泰(224)
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	陆俭明(232)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	陆俭明(240)
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	朱德熙(251)
歧义——语法研究的突破口·····	邵敬敏(261)
(六) 语用·····	(271)
语用分析说略·····	范开泰(271)
话语分析说略·····	陈 平(278)
话题、述题和已知信息、未知信息·····	沈开木(285)
语境与语言研究·····	西棋光正(290)
语境歧义分析·····	王建华(295)

(一) 绪论

汉语

朱德熙

汉语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并且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九亿四千万。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四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aŋ](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才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四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三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2个。介音有[i]、[u]、[y],辅音韵尾有[n]和[ŋ],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四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缺,其余三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1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2,北京话的韵母见表3。

表1 音节的成分

例 字	声 母	韵 母			
		介 音	主要元音	韵 尾	字 调
雨			yu		上声
牙		i	a		阳平
远		y	a	n	上声
音			i	n	阴平
瓜	k	u	a		阴平
摩	m		o		阳平
僧	s		ə	ŋ	阴平
条	tʰ	i	a	u	阳平
类	l		e	i	去声

表2 北京音声母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 字
p	b	ㄅ	布
p'	p	ㄆ	铺
m	m	ㄇ	木
f	f	ㄈ	富
t	d	ㄉ	德
t'	t	ㄊ	特

(续表)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 字
n	n	ㄋ	纳
l	l	ㄌ	勒
k	g	ㄍ	格
k'	k	ㄎ	客
x	h	ㄏ	黑
tɕ	j	ㄐ	基
tɕ'	q	ㄑ	欺
ɕ	x	ㄒ	希
tʂ	zh	ㄓ	知
tʂ'	ch	ㄔ	痴
ʂ	sh	ㄕ	师
ʐ	r	ㄖ	日
ts	z	ㄗ	资
ts'	c	ㄘ	雌
s	s	ㄙ	思

表3 北京话韵母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 字
ɿ	i	ㄧ	诗
i	i	丨	基
u	u	ㄨ	孤
y	ü ^①	ㄩ	居
a	a	ㄚ	八
ia	ia	丨ㄚ	加
ua	ua	ㄨㄚ	瓜
o	o	ㄛ	波
uo	uo	ㄨㄛ	锅
ɤ	e	ㄜ	哥
ie	ie	丨ㄜ	街
ye	üe	ㄩㄜ	厥
ai	ai	ㄞ	该
uai	uai	ㄨㄞ	乖
ei	ei	ㄟ	杯
uei	uei ^②	ㄨㄟ	归
au	ao	ㄞ	高
iau	iao	丨ㄞ	交
ou	ou	ㄛ	沟
iou	iou ^②	丨ㄛ	鸠
an	an	ㄢ	干
ian	ian	丨ㄢ	肩
uan	uan	ㄨㄢ	官
yan	üan	ㄩㄢ	卷

(续表)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 字
ən	en	ㄣ	根
in	in	ㄩㄣ	今
uən	uen ^②	ㄨㄣ	滚
yn	ün	ㄩㄣ	君
aŋ	ang	ㄤ	冈
iaŋ	iang	ㄩㄤ	姜
uaŋ	uang	ㄨㄤ	光
əŋ	eng	ㄥ	庚
iŋ	ing	ㄩㄥ	经
uəŋ	weng	ㄨㄥ	翁
uŋ	ong	ㄨㄥ	公
yuŋ	iong	ㄩㄥ	用
er	er	儿	二

① ü 在 l 和 n 以外的声母之后都写成 u。

② uei, iou, uen 前边加声母时, 分别写成 ui, iu, un。

声调是一个音节发音时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型式。北京音的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型式。如果把音高分成五度, 北京音的阴平是从五度到五度的平调, 阳平是从三度到五度的升调, 上声是从二度下降到一度再升到四度的曲折调, 去声是从五度到一度的降调。关于北京音的声调看表 4。

表 4 北京话声调

调 类	起 讫 点	调 号	例 字
阴平	55	ˊ	汤
阳平	35	ˊ	糖
上声	214	ˇ	躺
去声	51	ˋ	烫

以上说的是每个字单说时的声调。连读的时候, 某些声调会发生变化。例如两个上声字相连, 前一个会从原来的 214 调变成 35 调, 变得跟阳平调一样。此外, 有些字连读时读得很短、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声调, 这种字调叫轻声, 例如“石头”的“头”, “我们”的“们”。

传统的注音方法是反切。反切用两个字来注一个字的音。前一个字(反切上字)定被反切字的声母, 后一个字(反切下字)定被反切字的韵母和声调。例如: “耐, 奴代切”, “奴”跟“耐”的声母相同, “代”跟“耐”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所以就用这两个字来注“耐”字的音。由于语音的演变, 古代字书上的反切跟今音有的相合, 例如上边举的“耐, 奴代切”([n(ú) + (t)ài = nài])。有的不合。例如: “东, 德红切”, “东”与反切下字“红”的声调不同。“蓬, 薄红切”, “蓬”与反切上字“薄”的声母不同, 与反切下字“红”的韵母也不同。

1918 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 么 = [au], 么乃 = [an], 尤 = [aŋ]), 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 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 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看表 2、表 3)。自 1978 年开始, 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取代了威妥玛式(Wade-Giles system)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

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节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点。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没有形态变化。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词汇意义的后缀,例如英语的-ness, -ation, -ment之类。汉语没有此类后缀。第二,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的区别。汉语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跟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在印欧语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在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样的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例如形容词既可以充任谓语(这儿干净)、定语(干净衣服)和补语(洗干净),又可以充任主语(干净最要紧)和宾语(他不爱干净)。

词类多功能的必然的结果是相同的词类序列有时代表不同的句法结构。例如“出租汽车”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性词组(=出租的汽车),也可以理解为“动词+宾语”的结构。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汉语语法著作比起印欧语语法著作来,更着重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

由于汉语词类多功能,划分词类时,手续要复杂一些。过去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其次,印欧语的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定式动词,而词组(短语)里要是有的话,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对立,动词不管用在哪里,形式都一样,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正是因为这一点,有的汉语语法著作采用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即在词组的基础上描写句法,而不是像印欧语法那样以句子为描写的基点。

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还表现在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或称述补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跟印欧语的句子或分句不同,构造比较松散。这表现在主语后头可以有停顿(因此书面上往往用逗号点断),或者加语气词(这个人呐,很会说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语里主语往往可以略去不说。

主谓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中国地方真大。

这个人我从前见过他。

这两句的谓语“地方真大”和“我从前见过他”本身都是主谓结构。这种句式不但现代汉语里有,古汉语里也有: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孟子·离娄下)|蒙恬者,其先齐人也(史记·蒙恬列传),应该看成是汉语的基本句式的一种。

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构造。印欧语里没有跟它相当的格式。简单的动补结构是由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组成的(听懂|切碎|染红|洗干净)。这种结构后头可以带动词后缀“了”和“过”,语法功能相当于一个动词。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极其自由。例如“洗干净”是常说的,因为“洗”能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是“干净”。可是除了“洗干净”之外,也能说“洗脏了|洗破了|洗丢了”,甚至还可以说“把我洗胡涂了|把他洗哭了”。

从词序方面看,汉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所以修饰语不宜太长、太复杂。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原文后置的修饰语都得提到前边去。如果修饰成分比较多,句子就不太容易组织。这种时候,往往得把原来的长句拆成几个短句,使修饰语适当分散或者转成谓语。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三千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

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汉字跟它所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tàn kāu]的[kāu]、[kāu iào]的[kāu]和[t'iào kāu]的[kāu]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三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汉字“糕、膏、高”(蛋糕、膏药、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1. 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鸪”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鸪”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2. 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3. 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短”一类字。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可能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字义的变化比较小,而且两千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

字难。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龜”和“龍”特点鲜明,很容易认识,要记住怎么写就难多了。用汉字比起认和写都要难得多。所谓会用,就是要学会区别同音字,知道哪种场合下用哪个。例如“唯、惟、维”三个字同音。“维持”“维护”只能写“维”,不能写“惟”,而“思维”也可以写成“思惟”。“惟独”“惟恐”可以写“惟”,也可以写“唯”;可是“唯心论”“唯物论”又只能写“唯”,不能写“惟”。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再继续简化。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和原形,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人们学习和使用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引起波动。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三千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省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语音的差别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 d g]、不送气清塞音[p t k]和送气清塞音[p' t' k']三套,官话方言只有后两套。广州话辅音韵尾有[m n ŋ p t k]六个,苏州话只有[n ŋ ʔ]三个,北京话只有[n ŋ]两个。广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九个调类。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烟台话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有平声、上声、去声三个调类,是声调系统中最简单的方言之一。

由于现代方言的调类与古调类之间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调类的名称来标记现代方言调类。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调类名称相同,并不表示调值相同。例如北京话的阳平是升调(35),天津话的阳平是高平调(55),而汉口话的阳平则是曲折调(214)。

上文说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别大,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小。这是从大体上说的。从细处看,词汇和语法上相异之处也并不少。拿词汇来说,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词是全国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词里有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异。拿语法来说,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形式、形容词的后缀、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以及名词后缀“子”和“儿”的表示方式(例如“儿”杭州话用成音节的语素表示,而广州话和温岭话用变调表示)等等在不同方言里有时有相当大的差别。

方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别可以举“把”字句和反复问句为例。“把”字句是官话区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种句式,可是粤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这种句式。例如北京话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干净),广州话往往要用“动词+宾语”的说法(洗干净件衫)。在大部分官话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V不V”(V代表动词,例如:去不去|认得不认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例如昆明话)以及一部分吴方言(例如苏州话)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可V”(可去|可认得)。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

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 ŋ p t k]之外,还有[b d 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ŋ p t 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ŋ]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和“着”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一百八十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三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两千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同时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至于新闻报导、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大概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溶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节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ai]或是[tai]。后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一百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书面上就是汉字)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总起来看,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对于外族人来说,学会了口语不等于学会书面语。对于本族人来说,学会用书面语写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汉语研究 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纪元后100)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公元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我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不小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本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李 荣:《语音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7。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赵元任: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1988。

Fang - 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詹伯慧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关系,这些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方言与共同语的实质和异同。认清方言和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试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剖析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

一、从语言渊源方面看,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之间可比作兄弟姐妹的关系,却不能比作父子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构成因素。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汉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汉族人民所操的语言自然会不断有所变化。时而分化、时而统一,各种不同的地方方言正是在这分化与统一的过程中先后产生的。有的方言形成于很早的时期,有的方言却是较晚时期的产物,这早已为研究方言发展史的学者所阐明。距今 2000 多年扬雄编著的《方言》一书,已经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方言现象。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文字的使用是统一了,可是,方言不可能因此就统统消失。在民族统一,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方言众多而又缺少统一民族共同语的局面毕竟不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一个全民共同使用的语言,总是有利于治国安邦,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对于汉语来说,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以长期以来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汉语作为首选对象,这个北方汉语,实际上也是一个方言,只不过是汉语中最具影响力,通行范围最广的一种大方言罢了。一个方言要成为共同语当然还得有所加工,有所规范,而不可能把原汁原味的方言原封不动地拿来作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语。因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明确界定它的内涵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这三句话中,除了语音指明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外,词汇、语法提的是北方话为基础,典范现代白话文为规范。把这三句话合起来看,显然就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方言当成共同语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还经常提到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北京音虽然是普通话的标准音,北京话中一些土音土词,仍然被排除在普通话的门外,被作为“北京方言成分”来看待。北方方言既然作为共同语的基础,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这就使它从方言的大家庭中上升到居于各个方言之上的地位,成为“老大”“兄长”,而其他方言也就安在弟弟妹妹的位置上了。正是因为汉民族共同语是在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我们断定汉民族共同语跟各地方言本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们同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说它们的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就比较恰切了。一个民族只能有一个共同语,既然汉民族共同语已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其他地区的各种方言,也就不再有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可能了。

二、从语言的性质和内涵看:方言和共同语都具有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具有作为一个语言所必须具备的完整体系的语言。换句话说,方言和共同语都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工具。我们说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分支,并不意味着方言只是共同语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完整的独立的语言。正是由于方言与共同语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方言中的许多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自然也就跟共同语相同了。当然除了相同的因素以外,方言中必然还会有一些跟共同语相异的地方。没有相同之处,我们就难以判断它们是有着共同渊源的方言和语言(共同语);而没有相异之处,我们也同样无法说明它们是共同渊源下的不同方言和语言(共同语)。因此,就语言本身的性质来说,方言和共同语既是各自具有语音、词汇、语法的完整语言体

系,又是明显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亲密关系的语言(或方言)。值得注意的是:方言和共同语都在发展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共同语形成以后,还会继续从其他方言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犹如30年代就有一些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词汇被吸收到“国语”(普通话)中来一样,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南方经济“先走一步”对北方的影响,又有不少粤方言的词汇被吸收到共同语中来。至于各地方言中不断涌入共同语的因素,那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事了。就这一点来看,方言与共同语并非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在这双向影响的格局中,实际上是方言吸收共同语的因素很多,而共同语吸收方言的因素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了。今天举国上下正在花大力气推广普通话,在“推普”高潮迭起的方言地区,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尤为显著。普通话的词汇通过影视传媒等渠道进入方言的为数不少,有的方言甚至连语音系统也因经不住普通话的冲击而产生了变异。明显的例子就是吴方言上海话声调现在只有5个,而在老一辈市民的嘴里,却是有7个声调的,这种声调的简化无疑是民族共同语对方言影响的结果。

三、从语言社会功能看:方言和共同语虽然同样具有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但是,共同语一旦形成,它就向着作为全民族通用交际语的目标迈进,因为这正是共同语所应有的历史使命。这种作为全民族通用的语言必然要在全民族的每个地区得到普及,而国家和政府,也必然会为推广和普及共同语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以保证共同语能尽快深入人心,普及到每个国民中去。要真正做到人人都会说共同语,处处都使用共同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以上人口,方言复杂,地域辽阔的民族来说,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建立共同语就是为了普及共同语,目标非常明确,立场不能动摇。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终究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前进。目前我国南方方言复杂的地区,“推普”已明显取得进展,就是在广州以至整个珠江三角洲这样从来认为方言习惯比较顽固的地方,近年来会说普通话,愿说普通话的人也大大增加,社会语言环境已不再是只有方言独霸的局面了。共同语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当然就会相对削弱方言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发达的民族社会进展中必然的结果,是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符合全体人民,包括方言地区人民的利益的。地方方言,本来就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社会交际工具,它的社会功能始终只在一个地区之内发挥,它跟全民通用的共同语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实质上也就是语言应用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体现,明确这一点,我们在看待方言地区的“推普”工作时,自然也就因势利导,千方百计地为全民共同语在各方言地区的普及和推广鸣锣开道,会乐于做“推普”的促进派了。

四、从语言社会地位看:由于社会交际功能有所不同,方言和共同语通用的大小不一,这就决定了方言和共同语在语言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别。作为民族共同语,它是全民族乃至全国人民在一切公共场合和一切公务往来中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这一公共通用语的地位,以国家的语文政策及其相应的语文法规为依据,并写进了国家的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如“教育法”)中。国家还明确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对外代表我国作为联合国使用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外国人要跟我们国家打交道,免不了要学会我们的普通话,因为只有普通话才能走遍全中国,只有使用普通话才能和中国的政府机构进行业务接触。普通话具有的这种资格和地位,自然是汉语各地方方言所不能具有的。众所周知,南方的粤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汉语方言中最具“强势”的方言,在两广地区、港澳地区以至海外许多华人社区,粤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有相当充分的发挥,港澳地区甚至把粤语认作全社会共同使用的交际语,具有当地“共同语”的地位。但是,毕竟只能看作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跟港澳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不无关系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尽管粤方言在两广地区拥有数千万的使用者,甚至外省也有人为了某种需要学习粤语,但这些使用粤语的人,心中都非常明确:他们是在使用地方方言,而不是把粤语作为通用的共同交际语来看待。也就是说,许多说着粤语的广州人,也都意识到自己所说的是比民族共同语低一个层次的地方交际语,自己还需要学会比粤语作用更大,地位更高的全民共同语——普通话,才能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才能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胸襟。事实上,粤语不仅不可能跟民族共同语相比拟,甚至连作为广东省公共交际语的资格也不具备。因为广东省内方言众多,东部、西南部、北部都有大片不属粤方言的地区,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会说粤方言的大概还没有超过一半。因此,号称“强势方言”的粤方言,根本不可能成为广东的通用语,省内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和省内各地区间的业务往来,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来进行的。由此可见,尽管目前普通话在粤方言地区的普及率还不够理想,还须大力加强“推普”的工作,但事实上任何方言在整个社会语言的格局中,其地位永远也